



中国共产党早期三大武装起义纪实丛书

血潮

广州起义纪实

● 徐 雁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612971

●中国共产党三大武装起义丛书

血潮●广州起义



C0376095

责任编辑：朱永红
装帧设计：陈 新
封面题字：张辛汉

血 潮
——广州起义纪实
徐 焰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 78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375 插页：1
字数：433000 印数：1—3000

ISBN 7—5438—1625—3
K·306 定价：28.30 元

如书中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612971

广州起义前的叶挺

(起义时任红军副总指挥)



广州苏维埃政府
主席(未到职)苏兆征

广州起义时的叶剑英



广州起义领导人：中共广
东省委书记张太雷

廣州暴動的時工人赤衛隊

曾領導農民兵士，打倒革命的叛徒精衛

● 奪取廣州的政權，建立廣州農工兵代表會議政府



廣州起義中的工人赤衛隊



广州起义失败后,在举行“刑场上的婚礼”前的周文雍、
陈铁军合影

(周文雍任起义时的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总序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党组织武装暴动和独立创建军队，到今年已经有 70 年了！为了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70 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纪念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回顾当年的历史，我想了很多，有时晚上也睡不着。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我们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其实当时都称为暴动），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按照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办法，事事向国民党妥协，中国革命就会被彻底葬送。那一年春天和夏天我正好在武汉，到处传来国民党新军阀镇压工农运动和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眼看着武汉政府要同我们翻脸，同志们都很着急。后来党中央决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周恩来等同志到南昌组织暴动，并开展土地革命，才看到了希望。

领导和参加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的同志们是很英勇的，牺牲了不少人。

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如何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大家还都在摸索。例如南昌暴动后是想到广东去占一个海口，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没有深入农村去独立自主地建设根据地，结果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广州暴动也是想要占领大城市，这在那时敌我力量相差极大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无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广州暴动失败的消息传来时，我已到了莫斯科，还看到了一些牺牲了的女同志的照片。当然，广州暴动中也撤出了一些队伍走到了农村。相比之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秋收暴动后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才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后来，朱老总和陈毅同志也把南昌暴动剩下的队伍拉到那里去，井冈山成为代表武装斗争正确方向的一面旗帜。

在大革命失败和发动三大暴动的时候，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领导人都看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可是对于在中国如何搞武装斗争，怎么建设军队，还没有得出很正确的认识。当时我从国内到苏联红军学校去学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教给我们的还基本上是苏联那套正规战的战术。其实，当时如果请一些苏俄内战时的老游击队员来讲课，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1930年我回国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同志问我，回去能不能指挥一个团。我说自己是当教员出身，指挥一个团可能有困难。瞿秋白同志说，有人领导嘛，并说回去要搞一块根据地。可见，经过斗争的实践，那时都认识到要搞根据地的重要性。

不久我到了江苏南通搞武装起义，后来又转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十四军政委、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政委和红九军团

政治部主任，通过实际斗争深深感受到，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战争怎么个打法，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教条地照搬苏联那套办法是要吃败仗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创造，特别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军队，依靠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这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的创造。有了这些创造，军队以后才能发展壮大，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70年过去，我现在也已经90多岁。回顾当年的革命斗争，我深深感到，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要结合斗争实际加以应用。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如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搞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应吸取当年的历史经验，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进行开拓，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黄火青

1997年8月1日

从黄花岗、黄埔到红花岗

——代序

位于北纬 23 度线上的大城市广州，濒临浩瀚的大洋，背靠辽阔的大陆，是一个在地理上多受季风袭击的地点。来自南中国海的西太平洋台风无情地侵袭神州大陆时，这里往往首当其冲。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入侵的风暴，恰恰也首先以这里为登陆点。1839 年林则徐在此禁销鸦片的第二年，“英夷”凭藉着船坚炮利，在珠江口外向古老的“天朝”开启战端，从而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此后，无数的灾难伴随着英勇的抗争，在这个城市写下了曲曲悲壮的歌，而两次英勇的广州起义又作为其中最辉煌的代表，分别在黄花岗和红花岗留下了绚丽的历史印记。

如今在广州，再看黄花岗、红花岗这两个相距很近的纪念地，已经成了繁华的高楼区所包围的低谷。可在本世纪初，那里却是城东郊的野地和乱坟岗，起义中英勇殉身的志士忠骨

也在此集中掩埋。后人凭吊往昔峥嵘岁月，修建起纪念碑亭，颂扬的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革命、暴动和战争！

解放后出生的人们只是在歌中听过——“帝国主义侵略压迫，造成了我们的贫穷；官僚买办剥削，造成我们苦难深重……”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这只是抽象的说教，而在上一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前期，以上歌词却是那个社会里有目共睹的活生生的图景。当年只要站在广州的珠江边，放眼望去，看到的尽是挂着米字旗、星条旗、太阳旗和三色旗的外国军舰在水面耀武扬威。那时的一群群高鼻碧眼的西洋人和脚登木屐的东洋矮子们傲然而至，全然不像当今改革开放形势下遵照我国法令的要求规矩而来，而是在自己的炮舰掩护下打上门。这些洋人运来的是鸦片、高档消费品，极少有什么产业投资，运走的却是中国人民的膏血。对贫困落后的“东亚病夫”的歧视，使那些洋人处处高居于中国人的头上。在广州沙面的租界边，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外国人为了取乐而故意把一个个银毫子扔到珠江里，引得那些衣不蔽体的穷孩子向水中扎猛子捞取，换得他们哈哈的笑声……

中国传统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图景，在外国入侵的刺激下更加显现出来。那时的广州江边和街头，人们看到的是千百年不变的贫苦船户的木船更加破烂，而当权的那个畸变的阶层代表，即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们“师夷长技”时学不到外国生产技术，却能追随着世界潮流更换新型轿车，修建起一幢幢西洋式楼房。古老的旧城墙拆掉了，几条主要道路上的石板换成了进口的柏油，然而只有极少数富豪随之享受到西方的物质文明。为维护洋老板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又以进口的洋枪、手铐这些现代化工具来代替

刀矛、木枷，镇压那些愈发穷苦的大众。那时的广州可以说是三个世界：在外国租界的沙面无论是建筑样式或是居民都来自西方，走入那里好似到了欧美；沿珠江由西濠口至东山集中了许多中国富人和官府的房屋，多少有点近代气息；城西、城北及河南的大片区域尽是难遮风雨的竹寮棚户，污秽和饥饿是这里的特产，珠江里经常可见抛弃的死婴漂流直下……“不平则鸣”。如此的社会景象，使任何有血性、有志向的中华儿女特别是有知识的年轻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那时不用讲多少道理，甚至用不着读什么“共产主义 ABC”，只要到广州街头转一转，得出的结论就会是“如今世道真不公”，就会想到要“造反”、要“共产”。那时内地也有许多人跑到广州“讨生活”和见世面，可是没有多少人受到“南风窗”的物质诱惑，大部分人反而增加了对西方的憎恨。

当然，对于那些中华民族的先进子孙来说，在这个交会上引起的会是更多和更深入的思索。不同思想和文化的碰撞，在这里激起绚丽耀眼的火花。当年的革命、暴动，如同后来的改革、开放一样，恰恰是在这里发出了先声。

为了“奋斗救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同盟会把广州选为首义之地。1895年孙中山有感于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腐朽，带着从海外筹集的经费回到广州组织起义。尽管尚未成功，却成为他进行的第一次武装斗争。16年后，1911年3月29日即夏历辛亥年那个细雨蒙蒙的夜晚，同盟会领导的规模空前的广州起义爆发，打响了辛亥年革命的第一枪……

当天入夜时分，广州老城小东营内突然响起了“呜呜”的海螺角声。随着手执海螺的司号者吹响的战斗号角，手执

双枪的革命党领袖黄兴率领 130 名“先锋队”员从朝议第五号这座大院中冲出，直冲司后街的两广总督府。起义者虽然乘敌不备迅速占领了这座清王朝在南国的最高衙门，随之而来的却是水师提督卫队的反扑。起义者纵火点燃了总督衙门后，冲出街巷，在小北门、莲塘街、大石街浴血奋战。一夜拼搏的结果，除了黄兴等少数人脱险，其余举义的志士均英勇捐躯，事后有人收敛了 72 具尸体葬于黄花岗。对这次史称为“黄花岗起义”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先生曾评价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少数先驱者以其失败的起义，吹响了随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号角。

黄花岗上的碑石，的确铭刻着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在其自身历史上最为悲壮的斗争，今人看来仍然可歌可泣。不过客观地讲，这些奋斗虽然开创了民主革命的先声，却没有给全国人民包括广州民众带来地位和生活的改变。国家衰败如旧，百姓痛苦依然。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人虽然长期控制了广州政权，却迅速与旧的官僚豪绅同流合污。“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孙中山的不肖后继者们以广州为基地出师北上夺取了大半个中国（不过始终未完成过统一），却又从北方的腐朽军阀政客那里接收了恶劣的传统，并以这种政治黑浪淹没了革命的首义之地。在民国年间，国民党当局靠着海外华侨捐资，在黄花岗为当年的烈士修建起一座肃穆雄壮的陵园，却完全丧失了这些先驱者奋斗的精神，并转过头来压迫自己过去的依靠者和同盟者。也无怪乎，最大多数的民众对他们由失望转为愤恨，并在国民党的首义之地率先发出“打倒国民党”的呼喊声……

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两党的热血青年曾经满怀激情地汇集到同盟会进行推翻满清的斗争时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下，从珠江之滨到长江两岸都回荡过这样的歌声：

看见青天白日旗，
我们快快团结起，
团结起来杀仇敌，
夺回我们的胜利！那时候，
真平等，无阶级，
那时候，
自己做，自己吃，
同志们，满意不满意！

然而曾几何时，当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回过头来屠杀共产党人并压迫工农大众后，“青天白日”就不再是国共两党团结、象征“真平等、无阶级”的标志。那个蓝底衬十二角白心的旗帜，很快被革命的人们咒骂为“青面獠牙”，并成为举枪瞄准射击的靶子。共产党人打出的旗帜，则是象征工农当权的“铁锤镰刀”红旗。这一旗帜在秋收起义中第一次在农村举起，在广州起义中第一次在城市举起。系着红领带的人们所高歌的，也是颂扬红旗的《少年先锋队歌》——

看我们高举鲜红的旗帜，
同志们快来！快来！
同我们努力建设民主共和国，
劳动！做世界主人翁，
人类才能进入大同。
这就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

正是在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打出“红军”和“苏维埃”的旗帜，并在这一光辉旗帜下进行了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

若进行历史的纵向对比，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较之1911年同盟会所组织的广州起义规模要大得多，在红花岗留下的烈士遗骸也是黄花岗的几十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是真正依靠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而不是少数人的孤军奋斗。如今，站在这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南国都市的建筑群峰的谷底，再寻找那些拆迁后所剩无几的老街旧巷，也许已成为一件难事。在熙攘繁华的商业街中，已经实现小康并骑着摩托车奔向富裕的人们，大多难以想象70年前的饥寒交迫的工农兵大众的心境。那时，他们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低层次的要求——生存和温饱，真诚地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把枪支、木棍、铁尺和红旗高举过头顶，呐喊着从这些街巷中冲过……

是啊，那些现代人看来已是老旧不堪且土气十足的建筑，当年却曾是多少人向往的神圣之地——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中华苏维埃政府、赤卫队指挥部……那些在陈列室中印刷粗糙且纸张早已发黄的讲义、传单和宣言，时髦人可能都不屑一顾，可在当年却是点燃千百万人心中希望的普罗米修斯窃来的天火。

现代许多年轻人讲“追星”，其实这并不奇怪，人的心目中总要有崇拜，总要有追求。旧社会酒足饭饱的有闲者整天“捧角”，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态。在那个民族苦难的时期，有志的新一代也追星，不过追求的不是歌星、影星，而是民族的救星！

仅以广州起义那三天激战而论，中国革命史册上许多璀璨的明星——张太雷、恽代英、叶挺、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在这里闪烁出耀眼光芒。还有那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的主角——周文雍和陈铁军二烈士，更是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调写下了悲壮动人的篇章。的确，在中国革命的灿烂星空中，广州是一个掠过众多明星的区域，民主革命的两大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都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孙中山的主要战友黄兴、毛泽东的主要战友周恩来，也都在这座城市创造过名垂青史的业绩。而周恩来的名字，是与广州城东的黄埔军校联系在一起的。广州起义虽然不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然而发起广州起义的主力教导团成员，正是由周恩来等黄埔革命精神开拓者熏陶培养出来的 1000 多名中央军校武昌分校学生，即黄埔第六期生。广州起义，也写下了黄埔革命史上最光辉也是最后的一页！可以说，有黄花岗而后才有红花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不通才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从国民党的前身领导的广州起义到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从黄花岗到红花岗，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媒介，那就是黄埔军校。

孙中山开办创建黄埔军校，是有感于以往的中国和过去的国民党内没有革命的军队，所以要“联俄容共”，与共产党人合作办军校、建党军。尽管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所限，这一军校最后被蒋介石等新军阀引上了歧途，最终为维护封建买办集团的利益服务，背离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初衷。不过中国共产党人恰恰是通过参加黄埔军校的工作，开始了自己最早的军事活动，第一次成批地培养出自己的军队干部。